



印象与领悟

张雪扬 著

学林出版社

J0
12-c2

张雪扬 著

印象与领悟



——当代中国文化名人访谈记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周清霖

特约编辑:张赣生

封面设计:钱君匋

印象与领悟

张雪扬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6 插页 2 字数 129,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16-062-2/G·9

定价:8.50 元



作者像

代 序

巴 金

五四运动……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

——节选自《随想录·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目 录

巴 金

- 1 代 序
- 1 致读者
- 11 文化是一步步积累的
——叶浅予先生谈艺术创新
- 21 想得更深一层
——伍蠡甫先生谈画论
- 30 和观众的心灵贴近些
——黄佐临先生谈戏剧
- 40 妙悟无极
——三访刘海粟先生
- 53 妙在善于意会
——华君武先生谈幽默
- 62 中国传统文化的脊梁
——匡亚明先生谈孔子与艺术
- 71 云想衣裳花想容
——常任侠先生谈中国服饰文化
- 80 呼唤现代的中国风
——刘开渠先生谈雕塑
- 92 人到无求品自高
——冰心先生印象

- 102 大漠痴人
——常书鸿先生谈敦煌
- 112 我是乐观主义者
——夏衍先生印象
- 120 谁能不自针尖老
——启功先生印象
- 129 植根于民族与民间的厚土
——张仃先生谈装饰艺术
- 139 于非我处见本来
——赵朴初先生谈佛教与中国文化
- 150 为沟通理解架桥
——访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
- 158 别有甘苦在此中
——谢稚柳先生谈古书画鉴定
- 169 抱华精舍一席谈
——钱君匋先生印象
- 180 踏遍青山人未老
——王朝闻先生印象
- 187 编后记

致 读 者

我献给读者的，是这样一册薄薄的小书。然而，我十分珍爱这命运赐给我的收获，它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我为它感到自豪。

1986年，我被安排在一个内部刊物工作，编辑部只有两个人，办一份每期二十余万字的艺术文化方面的学术性季刊。我们连踢带打，什么都得干，从约稿到分发刊物，全都包办了。刊物有一个专栏，每期要发表一篇专访，所访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专家。这种稿件不易约到，常常因之延误了刊物的付排。1986年的秋季号发排了，可是预约的专访还杳无踪影。时间紧迫，不容再等，只好自己动手。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专访，现在也唯有硬着头皮去闯闯看。没想到从此成了惯例，我由北到南，长途跋涉，迎风冒雨，有幸拜识了当今中华文化界的一代名宿，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启发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

截至1988年我离开编辑部时为止，先后拜访了近十位前辈，发表了专访中的五篇，引起许多朋友的兴趣，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面或来信鼓励我继续做下去。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周清霖先生建议我再多采访一些，把专访编集出版，周先生不但数年一贯地督促我完成这件工作，还主动帮助我联系、安排，给予我很大的激励；重庆出版社李哲良先生，是我写的《服饰艺术与美》一书的责编，曾给过我很多帮助，他得

知这件事后也来信说：“如果不努力完成这件事，你会终生追悔。”别的朋友也是一样，都要我努力做好。

来自各方的鼓励和帮助增强了我的使命感，我重新一篇篇翻阅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专访稿，决心尽自己所能，把闪耀着前辈们睿智光辉、引人深味的意蕴发掘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有意突出了自己的“印象与领悟”，并以此为书名。

各篇的编排，仍以访谈时间的先后为序，有：叶浅予先生、伍蠡甫先生、黄佐临先生、刘海粟先生、华君武先生、匡亚明先生、常任侠先生、刘开渠先生、冰心先生、常书鸿先生、夏衍先生、启功先生、张仃先生、赵朴初先生、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谢稚柳先生、钱君匋先生和王朝闻先生。访谈时间的孰先孰后很难预先计划，完全视前辈们的方便而定，虽然原本不可能有主观安排的系统，但访谈的话题和我的体会是循着一定轨道进行的，也不能说内中完全没有联系。

我想还是先简要地说说各篇的要点吧。

叶浅予先生是我拜访的第一位前辈名家，那时正值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我们的谈话也就自然从这一点开始。叶老强调“文化是一步步慢慢积累起来的”，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人们常爱说“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实际做起来，又常把自己的主观意志装扮成“客观的必然”，似乎自己是在“替天行道”，结果却往往是“逆天行事”，造成大大小小的损失。事物的演化是多种因素交错作用的过程，究竟有多少种因素？它们之间是怎样交错作用？要经过多长时间过程？只有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深思熟虑的严肃学者才敢于承认对此说不清楚。这不是对人的能力的嘲讽和否定，却正是人的睿智的明证。

伍蠡甫先生特别强调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以求“想得更深一层”。“比较”是当今时髦的话题，但人们常常持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成见，实际上是打着“比较”的旗号，用作证明或强化自己成见的一种手段罢了。他们的结论不是产生于比较之后，而是确定于比较之前。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伍老强调用比较来使双方互相启发，以避免孤立看待任何一方所导致的偏颇，并借此来深化自己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都有其特定的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但不能互相取代，不能由一方消灭另一方。伍老的谈话正是在这一点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缺乏这种认识，那就或是导致追求全盘西化，或是导致一味抱残守缺，都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黄佐临先生就戏剧问题发表的意见，从一个具体方面更加深了我上述的认识。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正是一个体现文化交流的标本，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京剧，获得启发，由此构成新的戏剧体系，这并不是“中国化”，更不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取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一步步慢慢积累起来的，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分别塑造着西方人或中国人的思想习惯。要西方人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事物，或要中国人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西方事物，就近于要他们把各自原来的生活方式突然化为零，好像从来没有生活过，这当然是极难办到的，也不应该这样做。因此，黄佐临先生再引进布莱希特体系，也和布莱希特当年借鉴京剧时的性质一样。

三访刘海粟先生，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四个字：“妙悟”“无极”。刘老年逾九旬，自十四岁学画，已有近八十年的实践经

验，从事美术教育也已七十五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进行过种种探索，讲述过种种体会，经过毕生的琢磨、提炼，终于舍弃了一切无关紧要的话，把千言万语、千头万绪归结为“妙悟无极”四个字。如果谁听过刘老说这四个字时的语调，见过他写时的神态，就会感到这四个字在他心中的分量，并不能不为之震动。

和华君武先生谈幽默，是一次很有趣的体验。不拘形式的东拉西扯，完全没有思辨推理的味道，而正是在随便的气氛中，我充分领略了“意会”的妙处。华老明确地说，他可以结构幽默，但说不清幽默是什么。按照一般的说法，不知所以然就不能算认识的高级阶段。现在看来，未必如此。那“所以然”或许本来就是说不清，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只存在于悟性的心领神会之中，换句话说，其“所以然”就是“不知所以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即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匡亚明先生谈孔子，也给我很大启发。身为中国人，应该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固然，我们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认识或不认识都一样生活，但这仅是就生活习惯而言。如果我们想生活得更主动，更明智，那就须要自觉地把握中国文化传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它养育了我们两位最伟大的祖先，一位是华夏儿女血统的祖先——轩辕黄帝；另一位是华夏精神传统的祖先——至圣孔子。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上游，孔子的陵墓在黄河下游，这成了一种象征，似乎意味着从黄帝到孔子完成了奠定华夏民族根基的历程。

我对服饰美学和中外服饰史很有兴趣，写过一本这方面的小书和几篇研究论文。常任侠先生是近代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三位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有机会拜访常老，很自然地就

谈到了中国的服饰文化，常老十分推崇汉唐两代文化的鼎盛，并指出那是吸收了外来文化，广采博收的结果。但是，他也十分强调“中国的文化是基础”，中国文化是好是坏，不能听外国人说了算，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的人很多，我们对此应该心中有数，在放眼世界的时候，还必须清醒地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基础上。以往历史上有过故步自封的年代，奉泥古为正道，因循之风盛行；近代西风强劲，泥古变为泥洋，因循的对象变了，但因循的性质依旧。在这样的背景下，常老的一番话更应引起我们深思。

刘开渠先生谈雕塑，着重阐述了他对中国现代风格的精辟见解。什么是现代中国风格？又怎样来把握这一风格？是当前困扰着中国文艺界的一大现实难题。刘老没有给现代中国风格画定一个框框，他首先强调“这不能用形式来划分”，为中国现代风格的形式多样化提出了理论根据。接着又指出，现代中国风格只能存在于现代中国本身，而不是由哪一个人主观地设计的。并且，现代的中国正在飞速变化，现代中国气派也不会老是一种面貌。总之，它是由历史本身造就的，历史可以借助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去完成它规定的过程，我们却不能认为自己在决定历史，把历史视为奴婢，那样，历史终究要嘲笑我们。

冰心先生的名字，一直在我心中唤起特有的温馨感，能够拜访先生，是我多年的夙愿。她没有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娓娓谈着往事，谈童年，谈家庭，谈教书生涯。说到文学，先生把自己的创作历程概括为“甜酸苦辣”四个时期。临别时，先生为我题了林则徐的“事当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她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是知足的，对一些人热衷的权势是无求的，但

是她对祖国的前途、人民生活的改善却是不知足的，是有求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常书鸿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爱心奉献给敦煌，因而被国际文化界誉为“敦煌守护神”。他一说起敦煌，那份由衷的崇敬、眷恋和爱国热情便溢于言表。敦煌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也是一部形象的文化交流史，常老指出：早期十六国的时候，体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外来文化成分还较明显，到了唐代，中国本土很强，能够把外国文化吸收过来，丰富自己，再发展，敦煌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就完全中国化了。同时，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心态也有关系。”

年逾九旬的夏衍先生，是当今中国最受人们崇敬的几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元老之一。夏老在报告文学、剧本创作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更是中国电影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说起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他首先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而要有一个安定的大环境，使全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改善；就创作队伍本身来说，除了提高文化素质以外，还必须提倡相互间的竞争，按双百方针去做。当然这也离不开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如果搞不上去，艺术事业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夏老长期担任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谈到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的感受就特别深切。

初见启功先生，他那一口道地的老北京话，诙谐的语气和幽默感，就给我极强烈的印象。继续交谈，更感到启老极善于深入浅出地阐述道理，能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寓于眼前浅近的事物及生动的譬喻之中，很有些先秦诸子讲寓言的意味。因为我对书法艺术知之甚少，启老没有给我讲书法的技巧，只是宏观地谈论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中西文化交流

等问题。最后，启老把自己写的一首词念给我听，其中有句云：“已去难追，未来难找。留它不住跟它跑。百年一样有仍无，谁能不自针尖老？”一个人是这样，一国的文化是这样，中国的文化是这样，西洋的文化也是这样啊！

张仃先生数十年来在装饰艺术及绘画艺术方面的追求，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植根于民族与民间的厚土。张老强调立足民族与民间，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完全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且也不排斥吸收或借鉴外来文化。他的着眼点在于强化中国装饰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特色，以利于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张老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还未能充分地走向世界，大多数外国人还不能理解，这只能说是高鼻子的遗憾。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外国人所谓的“世界性”不包括中国，那就是虚假的世界性。所以他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首先是洋人应该走向中国。

赵朴初先生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使我学到了许多关于佛教的知识，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希望。赵老首先讲了对宗教应有的正确态度，应该认识到“宗教是文化”；接着用一系列具体的例子，说明了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他引用已故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话说：“不懂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史。”赵老还分析了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立住脚的原因，为我讲解了禅宗的形成及其原理，启发我领悟到佛经中所包含的生动的辩证思想，引起我许多联想与思考。

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工作，自本世纪初以来，西方的文献被大量译成中文，在中国广泛流传，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相对来说，我们把中国文献译成外文，介绍到外国去的工作却做得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杨宪益先

生和他的英裔夫人戴乃迭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前些年《红楼梦》的翻译出版更引起了轰动。听杨老谈翻译，他那种强烈的责任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戴乃迭先生，早年随同杨老来到中国，数十年如一日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并且由衷地热爱中国文化，更使我深为感动。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书画。但自魏晋以来，一千几百年间流传到今天的作品中，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常常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这就需要先做区别真伪的鉴定工作。为此，国家于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两次建立了专家鉴定小组。谢稚柳先生被任命为浩劫后组建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这以后的八年中，他们走遍全国各地，检阅了为众多的前人作品。听谢老讲述，使我深深感到这项鉴定工作的难度，那需要广博的知识、周密的推敲、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的态度。

钱君匋先生是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的篆刻名家，他由汉印入手，兼收近代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家之长，承前启后，影响深远。钱老又精通书画，早年还喜爱作曲，在文艺领域有多方面的贡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钱老为人处事的严谨，严谨做人、严谨治艺，全身心地投入，一丝不苟。篆刻是中国自古相传的独特艺术，钱老指出这方寸大的范围应能容纳广阔的天地，所以他十分强调“工夫在诗外”的多方面修养。书籍装帧是民初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新生的艺术形式，它和传统的篆刻艺术不同，不过在钱老看来，两者也有一致性，书籍装帧也应能包容更深广的内涵。

我第一次见到王朝闻先生，是在湖南张家界，看到王老兴味盎然地登山，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后来，王老到塘沽新港闭门著书，我又有机会先期赶往接待。过去我只读过王老的著作，那新鲜的见解，活跃的思想，说理的透彻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都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广大文艺爱好者及文艺工作者。一般多认为美学是一门玄奥难解的学问，但和身为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的王老接触，却不会使人产生那样的感觉。这使我领悟到思想的深奥与表达方式的明白易解并不是对立的，或许只有对深奥的学问能掌握到运用自如的境界，才更能以明白易解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吧？

限于时间和我的能力，我所做的还不多，领悟的也不够深入。

时光的流逝是无情的，我还曾想拜访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等许多前辈，但那时叶老和沈老已病重不能交谈，朱老也突然病逝，另外许多位前辈也因年高体弱不能去打扰，这虽使我感到遗憾，但也不是我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

最后，我衷心感谢巴金先生慨允选摘他著作中的一些片段为本书代序，钱君匋先生慨允为本书设计装帧，启功先生慨允为本书题签；感谢张赣生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学林出版社领导的支持，感谢周清霖先生的多方帮助；感谢我所拜访的前辈和众多朋友们给我的教益。

我感谢罗孚、柯文辉、宗家顺、杜滋龄、林同华、陈孝信、殷亚昭、常沙娜、彭放、袁林等先生在我采访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孙永学、马加峰、任鹏、安玉英等先生为我提供了照片。

这本书是属于时代的,属于大家的,我仍把它奉还给我们的时代,奉还给大家。

作 者

1992 年 8 月